

村庄信任、合作参与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罗明忠^{1,2}, 陆子欣¹, 魏滨辉^{1,2*}

(1.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广东广州510642;
2.广州市新型智库重点基地乡村振兴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642)



摘要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依托。利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探究村庄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村庄信任水平可以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且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模型、更换解释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相较于政治参与,村庄信任水平提升主要是通过激励农户集体经营性资产参股这一经济参与方式,助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异质性分析表明,在收入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村庄,村庄信任水平提升更有助于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此外,与社会信任相比,村庄政治信任水平的提升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因此,应着眼于强化制度建设,不断提升村庄信任水平,同时保障村民利益,激发农户参与集体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村庄信任; 合作参与; 资产参股;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中图分类号:F32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26)01-0109-12

DOI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26.01.01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是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的基本保障,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成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约98万个,确认成员约9.3亿人。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总额9.6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总额4.3万亿元。2023年,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实现总收入7157.3亿元,向成员分红823.06亿元^①。这些数据表明,中国的农村集体经济已经展现出一定的活力,并且为广大农民带来了实际利益。集体成员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的收益分配,特别是其中的弱势群体,能够获得更广泛和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推动了村庄共同富裕水平的整体提升^[1]。

然而,过去几十年农村经济体制主要依赖于家庭承包经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在这一体制下,过度强调个体利益的“分”,而忽视了集体层面的“统”,导致集体行动和合作行为协调困难,进而弱化了乡村社会的组织基础^[2]。此外,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对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或参与程度较低,导致未能充分发挥农民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尽管如此,农民作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受益主体和行为主体,依然在集体经济

收稿日期:2024-06-0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运行机制与政策支持研究”(23&ZD11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度乡村振兴定向委托项目“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研究”(GD25ZX03);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乡村振兴研究专项“赋权理论视域下广东返乡青年创业机制优化研究:困境剖析、能力构建与制度响应(GD25ZX13)。

①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

*为通讯作者。

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当农民认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前景,感受到自身的行为和权益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与保护时,他们的共同利益将促使其积极参与集体经济建设,并为其持续发展创造更多利益^[3]。这一认知与感受正是村庄信任的具象本质。因此,村庄信任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成功与否。

事实上,尽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类型的村级组织之间的权能关系仍然不清晰^[4]。在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产业项目往往由少数几名村干部主导,导致农民参与感逐渐丧失、话语权缺乏保障和村庄信任水平逐步下降。随着村民与村集体之间的利益关联逐渐弱化,农民对集体经济治理的参与意愿也随之降低^[5]。如果任由这一趋势恶化,农村集体经济将面临缺乏内生动力的困境,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此外,当前部分农民还倾向于抱守“等靠要”的思想,缺乏积极参与和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6]。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提供了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的主要利益已转向城镇,进而造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力资源的短缺,这一现象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社会信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其基本共识是,信任作为社会运行的润滑剂,对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7-8]。因此,社会信任也通常被称为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的文化基础。一个国家的繁盛和竞争力是由某一普遍性文化特征即社会本身所固有的信任程度的高低所决定的^[9]。从宏观视角看,社会信任水平提高可以通过减少企业交易成本^[10],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特别是在金融不发达或产权保障不健全的国家,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11]。来自中国跨省数据调查分析也揭示了信任水平的提高对地区经济发展绩效的显著正向影响^[12]。在微观视角上,信任在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润滑经济交易、促进社会稳定以及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往往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3]。村庄信任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14]、增强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降低农村环境治理难度^[15]以及引导农户进行农地流转^[16]等方式,激活乡村资源、资产和资金要素的潜力和活力,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只有在相互信任的环境中,组织才能形成凝聚力和号召力,主体之间才能有效协商与决策,个体才能实现集体行动。因此,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村庄信任成为推动合作参与和增强组织凝聚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当村集体组织能够实现公正、透明的管理与运作时,农民就会通过信息透明和有效的沟通机制,积极参与集体经济项目的决策、规划和实施。此时,农民不仅能够感受到自身权益的保障,还能够强化自身的地位和话语权,进而增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信任,促进共同利益的协同。这一机制对于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当前,学界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逻辑的探索上,聚焦于共同富裕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特征、现实困境以及实现路径等理论研究^[17-18]。部分学者通过案例分析或实证检验探究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后发现^[19],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村庄资源禀赋^[21-23]、村庄收入结构^[24]等村庄因素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体而言,尽管已有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对村庄信任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与内在机理仍缺乏深入探讨,更未基于村庄层面数据开展系统性实证检验,尚缺乏科学的实证依据与事实支撑。

基于此,本文借助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立足村庄共同体框架,探讨村庄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分析:首先,围绕社会信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经典关系展开讨论,结合村级单位层面的信任水平数据,定量分析了村庄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为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证证据。其次,基于合作与参与视角,从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两个维度分析了村庄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揭示了信任水平如何影响村民集体行动和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后,对不同收入水平和市场化水平的村庄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为提升村庄信任水平和激励农民积极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提供了可行的决策参考。

一、研究假说

1. 村庄信任水平提升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研究领域,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核心组成部分,通常被认为是提升社会运行效率的关键因素。它不仅仅是社会交往的润滑剂,更在集体行动和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5]。在这一背景下,村庄信任的形成与发展尤为重要,它不仅涉及农民个体与村庄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更体现为通过遵循社会规范与社区规则,农民个体能够有效嵌入村庄集体系统,建立起一种基于共同预期的社区秩序^[26]。这一信任体系为解决农村集体经济建设中常见的集体成员参与意识不足问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一般而言,村庄信任水平的提高,不仅能够显著降低集体行动中的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还能提升集体行动的效率和包容性,使得动员所有集体成员参与集体经济建设成为可能,并由此进一步促进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7]。

具体地,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村庄信任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方式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28-29]。交易成本理论指出,信息不对称是阻碍市场交易效率的一大关键因素。当交易双方缺乏信任时,交易所需的保障机制会增多,从而导致交易成本上升^[30]。因此,提升村庄信任水平,能够有效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为农村集体经济的稳定运行提供有利环境^[31]。此外,良好的村庄信任环境,不仅能够激发集体成员的积极性,还能有效降低因交易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从而充分释放潜在的社会资源。在信任的推动下,资源得以从低效向高效流动,交易规模和交易频次得以扩大,这些都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28]。只有在村庄信任的基础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更好地整合和利用现有资源,有效应对市场风险,实现持续健康发展。综上所述,村庄信任作为村庄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提出研究假说:

H₁:村庄信任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2. 村庄信任水平提升、农民合作参与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共同利益是农民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实现受益主体地位的基础,有效参与则是农民成为行为主体的途径^[3]。但这二者并非天然紧密相连,而村庄信任正是将其联系起来的关键因素。作为一种基于社会网络的关系纽带,信任既源于社会网络的互动,也能反过来扩展社会网络的边界,显著提高组织成员间的交往范围、频率和深度^[32]。随着村庄信任水平的提高,信息传递与交流的通畅度随之提高,村庄成员间的信息更为开放和共享。这种信息透明化促进了不同群体之间的深度交流与合作,有助于产业链和利益链的延伸^[33]。正如Gambetta所言,当人们说某人或某组织值得信赖时,实际上意味着该主体采取的行动对信任者有利,或者至少不会对信任者造成伤害,因而使其更倾向于与其进行合作^[34]。在信任程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更容易建立起非亲属关系的组织形式,如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9]。此外,信任关系能够强化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信任,促使主体间达成交流与合作行为^[35],进而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设。因此,提升村庄信任水平能够激励农民更积极地参与合作。

传统的分散型农户面临着文化水平低、信息不对称以及有限理性等个人因素的制约^[36],同时还受制于高昂的经营成本、较高的经营风险以及较低的经营效益等外部风险,使其单独进入市场时往往需要面对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目标的提出,传统的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亟需朝着以规模经营为主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创新转型,以实现更高效的资源整合。农民合作参与的本质在于群体联合与利益联结,通过农民与农村集体组织的协作,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资源能够得到有效整合和高效配置。这一过程不仅突破了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束缚,也提高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合作参与还有助于改善农民与集体组织之间的信息流通。农民合作组织能够拓宽信息渠道,及时获取农业政策、生产技术等相关信息,有效减少由市场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37]。集体的合作力量为农村经济提供了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与依赖政

府干预和市场力量的外部支持相比,促成农民深度合作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也是提升村庄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合作参与的深化还要求集体经济组织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合作机制,吸引更多元的主体参与其中。这种机制能够为农村集体经济注入持续动力,并在共建共营共享的基础上促进集体经济的稳定增长。在此,提出研究假说:

H₂:村庄信任水平的提升能够通过鼓励农民合作参与,进而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库(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该调查采用了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首先,在东、中、西、东北四个地区的省份中,随机抽取了10个样本省份,具体包括广东省、浙江省、山东省、安徽省、河南省、黑龙江省、贵州省、四川省、陕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接着,按照人均GDP将每个省份所有县(市、区)依次排序,平均分为高水平、中高水平、中水平、中低水平和低水平5组,从每个组内随机抽取1个县,并尽可能覆盖各省(区)在空间上的分布。每个省份随机抽取5个县,共调查50个样本县。然后,将每个县内所有乡镇(街道)按照人均GDP排序,平均分为高、中、低3组,从每组内随机抽取1个乡镇。每个县随机抽取3个乡镇,共抽取150个乡镇。紧接着,根据当地所有村的经济的发展情况分为经济发展较好和较差两组,从每组中随机抽取一个村。每个乡镇随机抽取2个村,共抽取300个村,每村随机抽取14户,其中2户作为备选,最后共抽取3600个样本户。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统计推断过程基于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由于每个阶段的抽样都是随机的,且分层设计能够减少层内差异,因此样本的估计值更接近总体的真实值。此外,多阶段抽样方法能够通过控制不同层次的结构,避免遗漏某些子群体,从而降低总体方差,提高估计的精确度。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所使用的变量主要来源于村庄问卷。为了确保数据的可靠性,剔除了关键变量中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并对部分离群程度较高的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以减少异常值对分析结果的影响。经过数据预处理后,本文最终得到了273个村庄样本进行分析。

2. 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已有研究多采用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总和来衡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38]。然而,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并不是都能够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自由支配。所以,本文借鉴芦千文等^[39]的研究,采用人均村庄集体资产总额去测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村庄信任。村庄信任是在村庄共同体框架下,村民相互之间产生的一种通过非正式制度作用而形成的秩序,是构成村庄内生秩序的基础^[26,40]。基于已有研究,本文将村庄信任界定为个体在村庄内部,通过共享的地方文化和社会互动形成的认同型信任关系。根据上述定义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村庄信任分为政治信任与社会信任两个维度。这一分类主要是考虑到村庄的政治结构与社交网络在信任的形成与维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一方面,政治信任反映了村民对村庄领导者或管理团体的信任程度,这通常与领导者日常管理决策中的透明度、公正性和效率密切相关。政治信任的高低直接影响村民对村庄决策过程的接受度以及他们参与集体经济活动的积极性。高水平的政治信任能够促进政策的顺利实施和村民的广泛参与,从而推动村庄经济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社会信任是基于村庄内部的社交互动与社群网络形成的,主要涉及村民之间的日常交往与互动。社会信任的形成通常依赖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习俗与经验,这些因素塑造了村民的相互认知与预期。当社会信任水平较高时,村民更愿意共享资源、交换信息并合作解决集体问题,因为他们相信他人不会违反社区的期望和规范。本文通过问卷中的4个问题——“您信任县(区、市)干部吗?”“您信任乡(镇)干部吗?”“您信任村干部吗?”和“您认为周边的人可信吗?”来构建村庄信任指标,具体可见表1。接着,本文利用熵权法对表1中各项信任指标的值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计算其权重,最终得出不同类型村庄信任水平的综合得分。

表1 村庄信任指标构建

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定义
村庄信任	政治信任	对县(区、市)干部信任程度	用1~5分赋值,1表示非常不信任,5表示非常信任
		对乡(镇)干部信任程度	
		对村干部信任程度	
	社会信任	对周边人信任程度	

控制变量。根据已有文献研究^[39,41],控制变量将从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选取。村庄层面具体包括村庄地势、村庄是否曾经是贫困村、村庄是否已经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和村庄老龄化程度。村干部层面具体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学历、任职时间、年龄以及村党支部书记是否兼任村委会主任。

机制变量:合作参与。本文将合作参与细分为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两个维度。尽管这两者在层次和功能上有所不同,但其核心目标都在于促进村庄整体发展。经济参与侧重于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引导村民直接参与经济活动,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利益的共享;而政治参与则着眼于提高村民在村庄治理结构中的话语权,强化其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监督。这两种参与形式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互为支撑、共同作用。因此,尽管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在层级和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异,但在村庄信任的推动下,它们共同形成了促进集体经济发展的双重驱动力。具体的合作参与指标构建见表2。

表2 合作参与指标构建

变量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定义
合作参与	经济参与	加入合作社	村庄加入合作社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
		集体经营性资产参股	村庄占有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户数占总户数的比例
	政治参与	参与选举投票	2019年村庄参加村委会选举投票占总户数的比例

3. 样本分析

表3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样本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平均发展水平为0.966万元。对比2019年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的资产总额(5.07万亿元)和农村户籍人口(7.7亿人)^①,可以计算出2019年农村集体经济账面资产的人均分配额为0.658万元。显然,本文样本中村庄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其发展成效较为平稳,但仍处于中等水平。关于村庄信任水平的情况,样本中村庄信任的平均得分为0.581,反映出村民对集体经济及集体行动的信任度较为良好,处于“比较信任”的状态。然而,尽管信任水平较高,实际参与度却表现出一定的差距。具体而言,村庄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比例为23.3%,持有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的比例为40.2%,而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比例为37.8%。这些数据显示,虽然村民的信任程度较高,但集体经济的实际参与度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综上所述,当前农村集体经济建设呈现出“分”强于“统”的结构性特征。一方面,部分农户对集体经济寄予较高期待,尤其期望集体能够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与发展支持;另一方面,农户对集体经济的实际参与度仍然偏低,二者之间存在明显落差。

4. 模型设定

由于被解释变量“人均村庄集体资产总额”是一个连续型变量,因此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Growth_i = \alpha_0 + \alpha_1 Trust_i + \alpha_n X_i + \epsilon_i + \eta \quad (1)$$

在式(1)中, $Growth_i$ 表示样本中的村庄*i*的人均村庄集体资产总额,用来衡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Trust_i$ 表示样本中的村庄*i*的村庄信任均值; X_i 表示一系列影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控制变量,包括村庄和村干部层面的变量; α_0 为常数项, α_1 、 α_n 为待估系数; ϵ_i 为随机误差项, η 为省份固定效应。

①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3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及其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村庄集体资产总额/村庄户籍人口/万元	0.966	3.794	
解释变量	村庄信任	采用熵权法计算的村庄信任水平	0.581	0.148	
	村庄地势	村庄地势(平原=1;丘陵=2;山区/半山区=3)	1.872	0.876	
控制变量	村庄是否曾经是贫困村	村庄是否曾经为国定建档立卡贫困村(是=1;否=0)	0.271	0.445	
	是否完成改革	村庄是否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是=1;否=0)	0.652	0.477	
	村庄老龄化	村庄60岁以上人口/常住人口	0.293	0.160	
	村党支部书记学历	村党支部书记学历(小学=1;初中=2;高中/技校/中专=3;大专/大学=4)	3.150	0.815	
	村党支部书记任职时间	村党支部书记任职年限	7.501	7.093	
	村党支部书记年龄	村党支部书记年龄	50.132	8.413	
	村党支部书记是否兼任	村党支部书记是否兼任村委会主任	0.623	0.486	
	合作社参与	村庄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比例	0.233	0.231	
	机制变量	集体经营性资产参股	村庄农户持有集体经营性资产股权的比例	0.402	0.352
		参与选举投票	村庄农户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的比例	0.378	0.238

三、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1. 基准回归

表4展示了村庄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模型(1)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其回归结果表明,村庄信任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为了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回归结果的因素,模型(2)进一步加入了村庄层面和村干部层面的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即使在控制了这些变量之后,村庄信任水平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模型(3)则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省份固定效应,结果仍然表明,村庄信任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集体经济发展具有正向影响。这一发现表明,村庄信任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进一步验证了H₁的有效性。

在控制变量方面,表4模型(3)结果显示,村庄曾经是贫困村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贫困村的历史背景可能导致其在技术和知识方面的匮乏,并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与非贫困村相比,曾经的贫困村在技术、市场信息和经济模式创新等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即便有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难以迅速转化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动力。此外,曾经的贫困村往往经历了管理不善和缺乏有效领导的阶段,这些因素可能削弱村庄信任的形成,从而阻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控制变量,如村庄地势、是否完成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村庄老龄化以及村党支部书记的学历、任职时间、年龄等,其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尽管这些变量在理论上可能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产生影响,但在实际数据分析中,它们的直接影响不如村庄信任的作用显著。例如,村庄地势虽然对交通和信息流通有所影响,但在现代社会,信息和资源获取渠道的多样化已经减弱了传统地理障碍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此外,村党支部书记的学历、任职时间和年龄等因素,虽然可能影响政策执行和管理效能,但这些个体特征的影响往往在缺乏强大社区信任和合作基础的情况下受到抑制,难以发挥其预期的正面效应。

2. 内生性处理

村庄信任水平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之间可能存在较为严重的反向因果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在选择工具变量时,本文选取了“本县内除了本村以外其他村庄的村庄信任均值”和“村庄年内犯罪案件发生次数”作为村庄信任的工具变量。一方面,本县内不同村庄之间的信任水平通常存在显著相关性^[42]。本县内各村庄在文化、经济和社会行为等方面往往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提供了一种间接但有效的方式来预测本村的信任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是间接的,其他村庄的信任水平不会直接影响本村的集体经济发展,因

此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要求。另一方面,村庄犯罪率作为社会治安的一种体现,可以直接影响信任的构建。高犯罪率会削弱社会凝聚力,从而降低村庄内部信任水平。同时,由于犯罪案件发生次数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符合工具变量的排他性标准。

表5中两个模型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对村庄信任水平的影响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同时,第一阶段的F值均大于10,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且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在第二阶段回归分析中,考虑到可能的反向因果问题,村庄信任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仍然显著。这一结果进一步验证了H₁的有效性。

3. 稳健性检验

第一,更换被解释变量。基准回归采用人均村庄集体资产总额来衡量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下文则通过将解释变量更换为村集体资产负债率(即村集体负债总额/村集体资产总额)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6模型(1)所示,村庄信任仍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负向影响村集体资产负债率。上述结果反映,村庄信任水平的提高可以降低村集体资产负债率,减少农村集体经营风险,进而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这也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第二,更换解释变量。基准回归采用的是熵权法计算村庄信任水平,本文通过更换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采用均值法重新计算村庄信任水平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回归结果如表6模型(2)所示,采用均值法计算的村庄信任仍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人均村庄集体资产总额。该结果与上文分析保持一致,进一步说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三,剔除特殊样本。在评估村庄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时,考虑到自然灾害可能对某些村庄的经济发展产生异常影响,本研究剔除了近三年内遭受自然灾害的村庄样本。如表6模型(3)估计结果所示,即便在剔除这些异常样本后,村庄信任水平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此外,考虑到经济基础较弱的贫困村庄可能与其他村庄表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本文也剔除了曾经被划分为贫困村的样本。经此调整,回归结果如表6模型(4)显示,在非贫困村样本中,村庄信任水平在5%的统计水平上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些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N=273

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1)	(2)	(3)
村庄信任	3.335** (1.594)	3.493** (1.620)	3.527** (1.575)
村庄地势		0.264 (0.170)	0.371 (0.236)
村庄是否曾经是贫困村		-1.271** (0.538)	-1.119** (0.533)
是否完成改革		-0.670 (0.522)	-0.256 (0.335)
村庄老龄化		2.168 (2.501)	1.602 (2.614)
村党支部书记学历		-1.081 (0.706)	-1.197 (0.728)
村党支部书记任职时间		0.044 (0.038)	0.041 (0.039)
村党支部书记年龄		-0.035 (0.050)	-0.037 (0.044)
村党支部书记是否兼任		-0.516 (0.459)	-0.691 (0.780)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970 (0.758)	3.752 (4.726)	4.006 (4.497)
R ²	0.017	0.112	0.145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表5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1)		(2)	
	一阶段	二阶段	一阶段	二阶段
村庄信任		7.044* (3.787)		19.138** (8.378)
本县其他村的村庄信任水平均值	0.376*** (0.064)			
村庄年内犯罪案件发生次数			-0.002*** (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第一阶段F值	34.264		19.758	
样本量	250	250	273	273
R ²	0.340	0.131	0.294	0.000

第四,增加控制变量。为进一步增强模型的解释力和减少可能的遗漏变量偏误,本研究引入了更多层面的村庄特定控制变量。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带动经济长期增长具有促进效应。村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打破村庄发展停滞的困境,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43]。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采用全村已连宽带户数比例来衡量村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控制村庄已连宽带户数比例后,估计结果如表6模型(5)所示,结论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美丽乡村建设和环境要素积累所构成的村庄社会文化底蕴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影响因素^[44]。本文尝试将村庄生态环境情况引入基准回归,利用“村庄近5年是否有过工业污染”作为指标衡量。控制该环境因素后的结果如模型(6)显示,村庄信任在统计上显著正向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进一步地,同时考虑数字化水平和生态环境两个控制变量后的估计结果见模型(7),村庄信任的正向影响依然在5%的水平上保持显著。这一结果强化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更换被解释变量	更换解释变量	剔除特殊样本		增加控制变量		
	(1)	(2)	(3)	(4)	(5)	(6)	(7)
村庄信任	-0.554*** (0.184)		2.198* (1.317)	3.716** (1.793)	3.667** (1.610)	3.544** (1.572)	3.698** (1.608)
村庄信任(均值法)		1.811** (0.826)					
已连宽带户数比例					-0.561 (1.119)		-0.452 (1.124)
是否有过工业污染						-0.959** (0.390)	-0.984** (0.4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71	273	123	199	263	273	263
R ²	0.197	0.144	0.229	0.184	0.148	0.149	0.153

4. 机制检验

根据表7的估计结果,村庄信任水平对农户参与合作社及选举投票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然而,村庄信任水平对农户集体经营性资产参股的正向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村庄信任水平提升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户持有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来实现合作参与。信任是投资行为的核心要素。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言^[45]，“如果一个人在集体物品被生产出来后,不会被排除在获取这一物品所带来的收益之外,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有动机为这个集体物品的供给资源奉献力量。”换言之,农户愿意将自己的资源投入集体经济中,首先需要对集体组织建立足够的信任。这种信任不仅仅是对集体的信心,更是在相信集体经济能够为其带来合理回报的基础上,才会主动参与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投资。随着村庄信任水平的提升,农户更倾向于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集体资产经营权,从而加速集体经济资源的整合与优化。这种信任关系的增强,不仅能够提升农户对村集体事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也能够有效降低农户间对于“搭便车”行为的顾虑,由此可催生更多的互惠行为^[46],最终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村庄信任水平的提升对农户经济参与的推动作用显著,这一机制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由此,H₂得到验证。

5. 异质性分析

一方面,收入水平是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村庄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异,由此导致不同区域的发展不平衡,因此村庄信任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为此,本文将村庄信任与村庄人均可支配收入(万元)进行交互,以分析其异质性效应。根据表8中模型(1)的估计结果,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8.448,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表明,在收入较高的村庄,村庄信任水平的提升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究其原因,收入较高的村庄通常具备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较好的物质条件以及较强的风险

承受能力。特别地,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意味着农户更具备应对外部失信风险的能力,进而更加愿意信任他人^[47]。这一信任基础促使农民与村集体展开合作,积极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建设。在此过程中,村庄信任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激发了高收入村庄农民参与集体经济活动的热情,实现资源共享与共同发展,最终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另一方面,市场化水平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集体经济组织通过经营权分离的方式,与市场主体开展合作经营。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创新的生产理念和先进的技术要素的引入^[48],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产生深远影响。为进一步探讨市场化水平在村庄信任促进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本文采用了樊纲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市场化水平^[49],并根据该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市场化和低市场化两组。高市场化组赋值为1,低市场化组赋值为0。表8中模型(2)的估计结果表明,村庄信任与高市场化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5.918,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这一结果表明,相较于低市场化地区,处于高市场化地区的村庄信任水平提升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社会活力更为充沛,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由此,市场化发育良好的区域能够更有效地激发村庄内外部资源的潜力,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50]。在这种环境下,村庄信任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增强集体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从而在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下,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6. 拓展分析

为进一步深化对村庄信任主题的理解,下文探讨了不同类型的村庄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影响。表9分别对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四个测度指标进行了回归分析。由估计结果可知,农户对村干部和乡干部的信任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相比之下,农户对周边居民和县干部的信任水平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在村庄信任的各个维度中,政治信任的提升相较于社会信任,更能显著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其原因可能在于,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干部作为政府的代表,往往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政策的落实依赖于地方

表7 合作参与的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经济参与		政治参与
	合作社参与 (1)	集体经营性 资产参股 (2)	参与选举投票 (3)
村庄信任	-0.005 (0.108)	0.302** (0.140)	-0.015 (0.1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73	270	272
R ²	0.213	0.381	0.354

表8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量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可支配收入 异质性 (1)	市场化异质性 (2)
村庄信任	4.628*** (1.736)	1.045 (0.885)
村庄信任×人均可支配收入	8.448*** (2.198)	
村庄信任×高市场化		5.918* (3.098)
人均可支配收入	0.614* (0.354)	
市场化变量		-3.855** (1.89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70	273
R ²	0.335	0.154

表9 拓展分析回归结果

N=273

变量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1)	(2)	(3)	(4)
对周边人的信任	1.222 (1.455)			
对村干部的信任		1.552* (0.912)		
对乡(镇)干部的信任			1.403* (0.767)	
对县(区、市)干部 的信任				1.049 (0.66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 ²	0.137	0.142	0.144	0.138

政府及村集体,而其代理人正是乡(镇)干部和村干部。对于村民来说,县干部往往囿于较大的心理和物理距离,难以直接影响村民的经济决策和参与意愿。相比之下,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与村民的日常接触更为频繁,他们的表现直接影响村民的信任水平,进而影响村民对集体经济的参与度。因此,农户对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的信任水平越高,村民对政策的认同感和配合度就越强,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集体经济活动,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相较之下,社会信任主要有助于促进村民之间的和谐关系和互动,增进农户之间的支持与帮助。然而,社会信任的提升并不必然意味着农户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集体经济活动或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综上,政治信任,尤其是对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的信任,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更为明显的正向作用,而社会信任的作用则较为间接和有限。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运用OLS回归模型,探讨了村庄信任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村庄信任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这一作用主要通过促进农户经济参与特别是激励农户持有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来实现。异质性分析显示,村庄信任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在人均可支配收入较高和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村庄,村庄信任水平的提升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政治信任水平的提升比社会信任更能显著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正向发展。具体而言,农户对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的信任对农村集体经济活动的参与有更强的激励作用,而社会信任的提升主要促进农户之间的互动和合作,虽然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但对农村集体经济的直接影响相对有限。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强化制度建设,持续提升村庄信任水平。村庄信任作为一种内在激励机制,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合作参与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村组织应通过构建多渠道、多样化的农村社会交流平台,促进农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例如,村庄可以搭建农民参与监督、商讨公共事务的有效平台,畅通社会交往渠道,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功能。尤其是在信息公开方面,村庄可利用网络和大众传媒等工具,加大信息透明度,将政策决策、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展等关键内容及时、准确地向村民公示,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具体事务推进过程中,村组织应尊重农民的决策意见,发挥基层党建的政治引领作用,强化组织动员功能。同时,村庄应积极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制改革与集体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尊重农民意愿,赋予其更多参与决策的权利,可以激发农民内生动力,进而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注入强大的活力。

第二,保障村民利益,激发积极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充分发挥集体资金和资产资源的联农带农机制,构建利益共同体,激励村民积极参与集体建设。政府可以通过人才培养、技能培训、金融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式,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享发展成果,使集体成员切实感受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来的红利。这不仅有助于增强成员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还能促进组织与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形成更强的凝聚力。通过将信任建立在可预期的利益基础之上,激发农民自觉承担发展责任的积极性,可以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此外,村民在集体经济中的参与不仅能提升其经济利益,还能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因此应进一步丰富集体经济组织的人力资本,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第三,因地制宜,充分挖掘村庄资源禀赋。中国地域广阔,因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历史文化等因素,区域之间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因此,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必须因地制宜,选择最适合本地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既要发挥“领头羊”的示范效应和“能人效应”,又要避免“精英俘获”和“能人控制”的负面影响。同时,建立健全有效激发“能人”带动作用的机制也是促进村庄信任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良性循环的重要举措。农村集体经济不仅要履行其经济职能,还应履行其社会义务,确保所有农村集体成员能够切实分享发展红利,从而进一步增强村庄信任。

参 考 文 献

- [1] 杜志雄. 共同富裕思想溯源及农民农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J]. 经济纵横, 2022(9): 21-29.
- [2] 郑有贵. 构建内生发展能力强的农村社区集体行动理论——基于发达村与空心村社区集体积累和统筹机制的探讨[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7(12): 63-69.
- [3] 公茂刚, 张云.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农民主体地位实现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8): 73-86.
- [4] 赵黎.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涵特征、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J]. 农村金融研究, 2024(2): 14-27.
- [5] 郭晓鸣, 张耀文, 马少春. 农村集体经济联营制: 创新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新探索——基于四川省彭州市的试验分析[J]. 农村经济, 2019(4): 1-9.
- [6] 贺雪峰. 农民组织化与再造村社集体[J]. 开放时代, 2019(3): 186-196.
- [7] NORTH D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8] 严成樑. 社会资本、创新与长期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12, 47(11): 48-60.
- [9] 弗朗西斯·福山. 信任: 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文版)[M]. 彭志华, 译.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
- [10] 刘凤委, 李琳, 薛文奎. 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 经济研究, 2009, 44(8): 60-72.
- [11] KNACK S, KEEFER P.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4): 1251-1288.
- [12] 张维迎, 柯荣住. 信任及其解释: 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 经济研究, 2002(10): 59-70.
- [13] 胡伟斌, 黄祖辉. 集体产权改革与村庄信任增进: 一个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 52(8): 28-46.
- [14] 蔡起华, 朱玉春. 社会信任、关系网络与农户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J]. 中国农村经济, 2015(7): 57-69.
- [15] 胡中应.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振兴战略研究[J]. 经济问题, 2018(5): 53-58.
- [16] 蒲实, 袁威. 政府信任对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乡村振兴为背景[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18(4): 28-36.
- [17] 闵师, 王晓兵, 项诚, 等. 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改革: 进程、模式与挑战[J]. 农业经济问题, 2019(5): 19-29.
- [18] 张浩, 冯淑怡, 曲福田. “权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 37(2): 81-94.
- [19] 李韬, 陈丽红, 杜晨玮, 等. 农村集体经济壮大的障碍、成因与建议——以陕西省为例[J]. 农业经济问题, 2021(2): 54-64.
- [20] 李梦怡, 史雅洁.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J]. 农业经济, 2023(11): 43-46.
- [21] 胡颖廉. 市场和社会共塑: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基于51位县委书记访谈文本的扎根理论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3(5): 54-64.
- [22] 马荟, 王彩虹, 周立. 资源资本化如何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基于多案例的探索性研究[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23(5): 65-74.
- [23] 王进, 李宁, 张逸轩. 数字乡村建设能否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基于CRRS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J]. 世界农业, 2024(5): 43-55.
- [24] 许泉, 万学远, 张龙耀.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创新[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5): 101-106.
- [25] ARROW K J. 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M].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74.
- [26] 胡必亮. 村庄信任与标会[J]. 经济研究, 2004, 39(10): 115-125.
- [27] 胡志平, 庄海伟. 社会资本参与乡村环境治理: 逻辑、困境及路径[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21(3): 76-82.
- [28] 余泳泽, 郭梦华, 郭欣. 社会信用的经济效应研究回顾与展望[J]. 宏观质量研究, 2019, 7(4): 80-95.
- [29] 罗明忠, 魏滨辉. 乡村治理、社会资本与农村收入差距[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0(6): 116-136.
- [30] COASE R H. The nature of the firm[M]. Berlin: Springer, 1995.
- [31] 王艳, 李善民. 社会信任是否会提升企业并购绩效?[J]. 管理世界, 2017(12): 125-140.
- [32] 柳建坤, 何晓斌, 王轶. 乡村振兴背景下特殊信任对返乡创业过程的影响[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5): 82-91.
- [33] 朱桂丽, 洪名勇, 刘天平, 等. 社会资本与返贫风险: 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来自西藏708户建档立卡户的证据[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3(5): 71-82.
- [34] GAMBETTA D.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M].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1988.
- [35] 张改清, 谢秀丽, 张建杰, 等. 农户信任如何影响农业绿色生产技术采纳? ——基于服务外包的中介效应[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2, 27(11): 252-264.
- [36] 罗明忠, 陈江华. 农民合作社的生成逻辑——基于风险规避与技术扩散视角[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6): 43-49.
- [37] 罗明忠, 刘子玉, 郭如良. 合作参与、社会资本积累与农户相对贫困缓解——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为例[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1, 42(5): 930-940.
- [38] 栾健, 张哲晰. 兼顾效率与公平: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 经济学家, 2024(1): 118-128.
- [39] 芦千文, 杨义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3): 84-103.

- [40] 贺雪峰,胡宜.村庄研究的若干层面[J].中国农村观察,2004(3):65-71,81.
- [41] 罗明忠,安韶辰.乡村治理、资源整合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J].新经济,2024(3):5-20.
- [42] 蒲艳萍,袁柏惠,张岚欣.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决策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23,45(4):111-126.
- [43] 刘佳,王军.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3(11):1-5.
- [44] 靳永广.比较优势转化、优质要素集聚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基于浙江省安吉县的经验观察[J].农业经济问题,2023(4):64-77.
- [45]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M].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46] 史雨星,姚柳杨,赵敏娟.社会资本对牧户参与草场社区治理意愿的影响——基于Triple-Hurdle模型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18(3):35-50.
- [47] 诸萍.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缓解流动人口家庭的经济相对贫困吗——基于微观家庭视角的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24(5):3-16.
- [48] 罗必良,孟晓志,耿鹏鹏.种植类型、市场化与村庄信任格局转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0(3):74-94.
- [49] 樊纲,胡李鹏,王小鲁.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
- [50] 曾繁华,吴阳芬.财政分权、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20,36(9):94-99.

Village Trust,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LUO Mingzhong, LU Zixin, WEI Binhui

Abstract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serves as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achieving agriculture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rural areas.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he 2020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village trust level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higher level of village trust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this finding remains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tests, includ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 modeling and alternative explanatory variable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enhancement of village trust primarily stimulates households to invest in collective business assets, thereby supporting the growth of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at in villages with higher levels of income and marketizatio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village trust on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more pronounced.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social trust, improvements in political trust at the villages level have a stronger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continuously enhancing the level of trust in villages,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villagers and incentivizing househol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key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Key words trust in the village;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equity participation; new-typ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责任编辑:陈万红)